

难忘的 1945 年

李 新

一、太岳区所闻

1944 年冬,大约是十一二月间,我随刘锡五到太岳区巡视工作。刘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我是组织科长。到太岳区后,我到阳城等县的乡村去调查,他留在区党委听各地来汇报,有时也就地作些调查。

在阳城的时候,听说王震、王首道的南下支队从延安出来,经过太岳区过黄河,到豫西,往南边去了。群众传说南下支队过河时,天老爷保佑,河水全结了冰,部队徒涉而过,非常顺利。这是因为河南人民对汤恩伯十分痛恨,认为他是‘河南四荒 水、旱、蝗、汤’的老总。日本打来,他就跑了。而老八路是神兵天将,这时来救老百姓,所以天老爷特别保佑他们。从这个传说,可见当时民心的向背。听到这个传说不几天,刘锡五就给我来电话,要我赶快回安泽,到区党委去听重要传达报告。

作传达报告的是区党委的代理书记王鹤峰。他说党中央认为目前抗战的形势很好,所以特别组成南下支队,以三五九旅为基干,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要从豫西经鄂、湘直到桂、粤,筑一道长堤,防止蒋介石由峨嵋山下来,从三门峡、三峡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同时,还由王树声、戴季英率两千余人到河南开展工作。

二、赶回北方局

听完王鹤峰的报告不几天,刘锡五就告诉我,邓小平有电报来,要我们赶回北方局。

1945年1月,我随刘锡五回到山西辽县的麻田镇,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从1940年就一直住在这里。回到北方局,看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要北方局加强对冀鲁豫工作的领导。

中央的电示指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是敌后最大的根据地。但减租息大半尚未进行,各项工作尚未走上正轨,群众基础还不巩固。黄敬(当时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又因病离职。为此,北方局即应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对减租减息工作有经验、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帮助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北方局必须亲自抓平原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仍留太行。随后,中央又通知:北方局去平原工作期间,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河南区党委由中央直接领导;太行、太岳两区党委仍由北方局就近领导。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立即率领北方局全班人马南下中原。

自 1939 年我率西青救（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剧团到前方后，即在太行山吃小米，我心里是多么地盼望有这么一天，八路军南下平原，实行反攻，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啊！现在，这一天果然来到了！我兴奋得晚上不能入睡，从延安到太行的一切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为安定心情，我依《水龙吟》词调写成了这首词的上阕：

“延安万古流芳，
延河送别多悲壮！
挥戈东渡，滔滔黄水，排空浊浪。
高举红旗，仰天长啸，太行山上。
望长城烽火，中原离黍，
凝眸处，增惆怅。”

一想，这样写不对，我这时还有什么惆怅呢？惆怅，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不是高兴得觉都睡不着吗？应该改写。正想如何改写，想着想着，一睁眼，天大亮了。于是，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起程。

三、直下中原

大约在 1945 年春节前，邓小平率领中共北方局全班人马，由太行山上清漳河畔著名的麻田镇起程，浩浩荡荡，直奔已被日寇铁蹄蹂躏将近 8 年之久的华北大平原——中原。当时所谓的全班人马，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因为自从 1942 年 5 月日寇大“扫荡”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

以后,北方局进行了大精简。组织部除部长刘锡五外,只有部员两人、干事一人。两个部员即干部科长郭森和组织科长李新;一个干事即周金光。而郭森是从冀南调来的,成立平原分局时已回冀南去了。周金光似乎也走了。所以这次南下,就只有刘锡五和我两人。宣传部除部长李大章以外,只有部员朱穆之等二三人,在我的记忆中,朱穆之并没有随李大章南下。统战部和政权工作部自5月“扫荡”张友清被俘和张衡宇牺牲后就没有再恢复。青委的江明早已离开,周惠则到太岳区担任了士敏县县委书记。妇委自蒲安修随彭德怀去延安后,似乎也没有人了。秘书处只有处长陈鹤桥随行,卓琳是否随邓小平一起南下我已记不清了。交通科的人较多,大概有十来个人,但他们有任务,是不能走的。城市工作部的人也是不能走的。为了到平原去加强群众工作,又从太行区把彭涛调来,从太岳区把周惠调回,是否还有其他,印象也模糊了。不过最多也不过两三人而已。总之,这次的全班人马,大约有十多个干部,但因有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锡五和李大章,在当时情况下,其声势确也是很浩大的。何况还有护送的部队呢。

这次南下中原,一路顺利。一方面是因为有部队护送(但护送的部队不多,所以我已记不清是哪个部队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因为1942年以后,我们对敌占区的工作加强了,许多伪军据点,都是两面派,对我们通过,并不阻拦。这同1942年我率领青委巡视团,随邓小平、戎子和到冀南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次过平汉路没有成

功，返回时还遭到日寇的袭击。这次通过不少敌人的沟垒，但没有听见敌人的枪声，如入无人之境。尽管日寇1944年经过豫湘桂战役，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从敌占区的情况看来，中国人心不死；“中原父老望旌旗”，我们的反攻，现在虽然还是局部性的，但最后的胜利已经是不远了。

一踏到平原的土地，我们就欣喜若狂。抬头一望无际，尽是麦田，而且每天都吃白面，这和太行山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每天一大清早，太阳就出来了，要很晚很晚，太阳才落下去；而在太行山则要很晚才看到太阳，很早太阳就被山遮住了。似乎平原的一天要比山区长得多。不过仔细一想，平原的同志们坚持抗战多么艰苦啊！他们每天都盼望早些天黑，晚些天明，他们真是度日如年。这时我们就觉得太行山可爱了。要没有太行山，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呢。

不几天，我们就到了濮阳。当时，中共平原分局就设在这里。

四、在 濮 阳 的 争 论

我们到濮阳后，受到平原分局同志们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对分局干部的讲话，也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邓说：当前革命形势很好，抗战胜利已不成问题。但必须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必须防止蒋介石抢夺和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为此，中央已派王震率部南下，从豫西、

鄂西以至湘赣、桂粤，在平汉路西修一道大堤，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从三门峡和三峡涌出来。这就像古代修筑万里长城一样，防止敌骑南下，到中原来抢夺秋收果实。今天，中央又要我们到冀鲁豫来，帮助你们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并向南和新四军的五师、四师打通联系，又在平汉路东再修一道长城，或叫再筑一道大堤，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泛滥。黄水在中原是经常泛滥成灾的。蒋介石也和黄水一样，你们这里不是叫‘水、旱、蝗、汤’吗？汤恩伯去年被日本人打垮了，我们就是不许他再回来。中原人民是最善于筑堤防水的，现在我们对付蒋介石，说像对付黄水为患一样，这叫做‘筑堤防水’。邓小平很会讲话，讲得既深刻，又生动，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

随后是分局和各地的同志们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汇报的中心是发动农民，主要是减租减息工作的情况。这时冀鲁豫各地正在开展‘雇、佃、贫运动’。何为‘雇、佃、贫’？就是雇农、佃家和贫农。当时冀鲁豫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搞得很‘左’，只强调雇、佃、贫，不注意团结中农，甚至对中农连提都不提了。我们这些从太行、太岳来的人，见此当然感到不安。因为现在还在抗日嘛，地主、富农、开明士绅都要团结，怎么连中农都可以不要呢！但是，他们这里的群众运动确是搞得轰轰烈烈，邓小平、刘锡五、李大章不好说话。彭涛是太行来的，周惠是太岳来的，说话也有顾虑。于是他们都推着我出来讲话。那时，分局书记黄敬因病到延安去了。代理书记宋任穷又到前面管军事工作去了，分局管群众工作的是张霖之，驻

地濮阳的地委书记(或副书记?)是赵紫阳,地青委书记是纪登奎。在汇报和讨论中,平原方面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他们都一致支持说雇、佃、贫运动正确,尤其是纪登奎,分局驻地就是他在那里“坐村”。他讲得很生动,很动听,坚持雇、佃、贫也最坚决。纪登奎是我在北京局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生,所以这次从北方局来的人都认为我出来说话最合适。刘锡五还专门为此和我谈过话。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说话了。

一到濮阳,我就注意到驻村去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会议开始后,我是白天开会,晚上到群众中作调查。尤其是大家要我发言后,我更深入地作了专题调查。经过深入的了解,我发觉这里雇、佃、贫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强迫命令很严重。群众每晚上听见敲钢轨的声音(当地群众把破坏铁路拉回来的钢轨吊在树上,敲击它便是号令群众集合的钟声),便跑步赶往会场。就连小脚老太太也都提着马扎,一歪一扭地赶着去开会。会场上鸦雀无声,秩序井然,就像我们的正规部队集合时那样的严肃。我一看到这种现象就怀疑,经了解,果然是强迫命令的结果。雇、佃、贫农,社会地位低下,很容易接受强迫命令。当他们被组织起来,连中农也不要,就感到很孤立,便一心依靠八路军共产党。而经过减租减息,特别是通过清算退租,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便又骄横起来,更不注意团结全村中农以上的群众。这样的地方,如果日寇再来,要建立伪组织是很容易的。

我把情况了解清楚后,便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的发

言。我根据太行的经验，说明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说明不团结中农，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由此证明中央既依靠基本群众，又注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而且，基本群众就包括中农在内，只要雇、佃、贫，就会脱离相当多的群众，就会孤立，群众感到孤立，就不会自觉地起来，那就只会是强迫命令了。这时我把调查到的材料，把驻村的真情况讲了出来，到会的人都大吃一惊，谁也无话可说。纪登奎虽然不服气，有时争了几句，但在事实面前，尤其是在中央明确有政策面前，他也只好忍着不说话了。

最后由邓小平做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平原分局的工作成绩，称赞军队打胜仗，扩大了解放区；地方干部特别辛苦，支援了战争，也发动了群众。在平原地区的地方干部，坚持抗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特别关心他们。然后着重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他说：在敌后，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农民，就必须减租减息，要减租减息，就得依靠雇、佃、贫，冀鲁豫的同志们着重发动雇、佃、贫是对的。但是，今天是抗日战争，不是土地革命，一定要把中农团结好，同时还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就是搞土地革命，也是要团结中农的。从前‘左’倾路线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团结中农。太行、太岳在发动群众中注意团结中农，有好的经验。总之，我们是来帮助冀鲁豫同志们做工作的。首先，太行、太岳的同志要向这里的同志们学习，这里的同志们也应该学习太行、太岳的经验。现在，我们开始局部

反攻了,不久就会大反攻,抗战就会胜利。但是,同志们切勿骄傲,一定要虚心,要团结,争取胜利早日到来。邓小平的总结,面面俱到,一场争论,就此结束,大家都感到满意。

五、难忘的奇遇

在濮阳,我还有一次终身难忘的奇遇。

群众为了欢庆春节,特地请来大戏班唱戏。濮阳虽属河南,但地近山东,群众的性格豪迈粗犷,颇有水泊梁山的英雄气概。集上人们喝大碗酒,吃大块肉。唱戏时声音高亢,尤其是花脸,力竭声嘶地大喊大叫,令人震耳欲聋。

那天我看戏看得正带劲的时候,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肩上一拍,蓦地回头一看,原来是‘死鬼’彭梦庾,叫我大吃一惊。我定睛细看,不错,这不分明是活生生的‘清谈家’吗?我们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许久才放开。这时,我开玩笑地问他:“你不是老早就‘万岁’了吗?今天不能来找我去替死呀!”他轻轻地给了我一拳,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这一幕情景,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际。

我和彭梦庾 1940 年一起在北方局青委工作。我担任青训班主任,他当副主任,亲如兄弟。我俩都是四川人,爱吹牛,彼此戏称‘清谈家’,别人也都这样称呼我们。1942 年 5 月‘扫荡’时,他被俘了,传说他与张友清一起被敌人杀害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其实他被俘后押往太

原，敌人审问时，他故意说是河北南宫人，因为他巡视工作时到过南宫，熟悉那里的情况，并学会说几句那里的话，因此连翻译都被他骗过了。这次审问，凡说是南方人的都被认为是老红军给杀了。张友清因为是中共著名人物，敌人有他的照片，所以也被杀了。彭后来被送往东北作苦工，在黑龙江挖煤矿。在听到又要把他们送到日本作劳工时，他联络了一部分可靠的人组织暴动。暴动虽然成功，但逃到森林里无法立足，于是便分散了。他找到一个地主家当长工，这家人有爱国思想，尤其是那位大少爷是个学生，很同情抗日军队。后来便是在他的帮助下，彭梦庾才能够和一个难友（一二〇师宣传队副队长？）一起回到石家庄附近那位难友的老家。经过打听，他们知道北方局已到濮阳，于是那位难友故意带上他的小侄女，一起赶到濮阳来。那个小女孩不过十一二岁，很机灵，我故意装成敌伪人员来考问她，她回答得一丝不漏，因此我相信他们一路上是很顺利的。

上述情况，是我和彭梦庾谈话后得知的。我向刘锡五做了汇报。锡五说：在前方不便审查。送回延安去吧。在延安，对他这种传奇式的经历也无法做结论。后来到了东北，张闻天经过认真调查，证明他所谈属实，肯定了他们的斗争，恢复了他的党籍，并任命他担任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他调到江西工作。江西省长邵式平很赏识他，让他当了省政府的秘书长，同时还是省委的秘书长。他这时在江西真是红极一时，曾几次邀我到庐山去游览，但我都因工作繁忙，未能如愿。一直到今天，我

也未曾亲上庐山，很可能是一生的憾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彭梦庾这个江西的大“走资派”当然在劫难逃。但他却善于躲避，造反派很难捉住他。有一次造反派追到庐山来逮他，他实在无处躲藏，便躲进了毛主席的住所。造反派明明知道他躲在毛主席那所特别的庭院里，但谁也不敢闯进去，因此得免于难。

“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周惠邀到内蒙古任自治区副主席。后来又回到东北工作了一段之后便离休了。去年秋天，因跌交倒在地上便仙逝了。听到他的噩耗，我不胜悲悼，现在提笔写到这里，一想起我们在太行山上的真挚友情，我的手便止不住发抖，无法再写下去了。

六、赶 赴 豫 东

在濮阳没有住多久，彭梦庾就起身往延安，我也就起身赶赴豫东去了。

这时北方局决定在平原分局下面，设立一个豫东区党委，辖十二地委和十三地委，十二地委在水东（黄河改道后黄泛区的东面），十三地委主要在水西。我记得区党委书记是戴晓东，组织部长是王一心。其余的人事安排我已记不清楚了。我现在看到的党史材料，有关豫东区党委的事竟一字也没有。我相信经过认真查考，豫东区党委成立的经过和它的活动情况，总可以搞清楚的。

我到豫东，是刘锡五和我谈的话。他说北方局决定新成立一个豫东区党委，因缺干部，要把王一心从太岳调到

区党委当组织部长,把你调去担任十三地委副书记。现在王一心还没有到,你可随部队先走。王一心到职后,由他和你再联系。王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科长(刘尚志之后,郭森之前),我们曾共事两三年,非常熟悉。因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走得很急,我也赶紧跟着离开了濮阳。这时十三地委在水西,我也随部队过了黄河。但刚一过黄河,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快到水东去。我于是离开部队,由地下交通带领着再渡河东去。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的中心区杞县。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两渡黄河,并且经过黄泛区,使我对黄河两岸人民的苦难,有了初步然而十分深刻的了解。那一带的人民群众,居无定所,随时迁徙。所谓房屋,只不过四根砖柱,另外有一只小船,系在一根砖柱上。黄河水来了,一家人就到船上住,等水涨过砖柱,他们就驾着小船,四处飘流,随遇而安。等黄河水退了,他们又回到老家那四根砖柱内居住。因为砖柱上刻了字,所以能各回各的家。各家的土地,也可以从砖上的字,按方向、距离和面积测量出来,毫无差错。一般情况下,黄河是秋后退水,人们可以赶回家去种麦。他们种麦的方法很简单,前面一个人拉着犁走,后面一个人用手把麦种放进那浅浅的犁沟里面,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犁沟麦”。因为泛滥的河水淤成的泥土很肥沃,所以“犁沟麦”的收成很不错。不过要早种早收,种迟了或收迟了就有被河水淹没的危险。这一带人民主要就靠这一季麦收过日子,实在穷得可怜。家里什么也没有,穿着之破烂,看起来都像乞丐一般。

我们在太行听说平原老百姓吃白面，哪里知道他们比吃小米的山西人还苦得多呢。到黄泛区看到的景象，更令人惊异！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连白云经过这里也变成了黄色的。纵长至少一二百里，横宽数十里的黄泛区，大部分地方水都不深，可以步行，但脚一踏进去，浅处拔起来已感困难，越深越难拔脚，到更深的地方，则越拔越深，甚至于有灭顶之灾。这和红军经过的草地颇为相似，而这里是黄天黄地，中间还有深浅莫测的黄河流水，更增加人们的恐怖感。因有交通员引导，我们是从黄泛区上游的边沿到水东去的。上述的情况，大部分只是看到和听说，并没有亲历其苦。在随部队渡河南下的时候，我的情绪很高，曾写下一首诗记行，名曰《南下》：

中原父老望救星，
天上飞来八路军。
万里黄河今夜渡，
千寻江岸几时平？
壶浆箪食迎郊野，
戴月披星奔远程。
胜利归来再相见，
房东休怪未辞行。

等到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虽然对抗日反攻的形势仍然感到鼓舞，但人民生活的困苦却使我心中感到很难过，连一点写诗的情趣也没有了。

七、在杞县工作

我赶到杞县时,豫东区党委正在开会。王一心在会下告诉我:因为十三地委在水西,这时河南省委已成立,而河南省委直属中央,水西究竟归河南还是归豫东区,尚未确定。对这个问题,豫东区党委不好说话,北方局和平原分局也要等中央决定。不过,水西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根据地,他们地委和专署机关人员以及几个县的干部现在都还在水东。因此区党委决定你暂时担任十三地委组织部长,把十三地委在水东的人员全部管起来。至于如何开始工作,等再研究一下才决定。

我虽然列席区党委的会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用来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这里本来是河南东部,因为黄河改道,才和河南其他地区分隔了。由于日寇占领了津浦路和陇海路,这样,黄泛区以东至两条铁路之间的三角地区便称为豫皖苏边区。从1938年到1941年,这个地区都属于新四军活动的范围。1941年以后,党中央决定这个地区仍归华中局,但由冀鲁豫代管。1944年汤恩伯被日军赶跑后,我八路军分两路(豫西和豫东)南下。到1945年,我豫西部队又向豫中发展,以至成立了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我平原分局成立豫东区党委和豫东军区也正是这个时候。但这时水东地区的根据地,其中心比较巩固的地区也不过睢(县)、杞(县)、太(康)交界处的一百来个村庄。现在,在这个狭小的地方,除豫东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外,还住着

一个军分区（十二军分区）以及十几县委、县政府和几个县大队，到处都是机关，到处都是干部，实在拥挤不堪，而且又没有发动群众，以至连给养都发生困难。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当务之急，一是军队趁势向前推进，极力扩大解放区；二是集中干部，把中心区一百来个村庄的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减租清算，巩固根据地，以便加速反攻，消灭敌伪，并防止汤恩伯之流的顽固势力卷土重来。为此，我建议区党委组成一个工作团，把所有十二、十三地委的有关干部都集中起来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愿承担这项任务而不必到十三地委去工作了。区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任命我为杞县工作团的团长（因为中心区大部分都属杞县）、中共杞县工委会书记兼杞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

这次区党委开会，正值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继意大利之后彻底失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已毙命，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在讨论政治形势时，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认为日寇的末日即将来到。但同时也感到蒋介石必将趁日寇灭亡之际，从峨嵋山下来和我们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我们必须赶快“筑堤防水”，以免“祸水泛滥”。眼看平汉路西那道堤修得快，王震部队已到湖北、湖南，快要与两广打通了，而我们平汉路东这道堤，虽说在水西已有很大发展，但至今还没有和新四军的五师和四师打通关系，联结起来。也就是说这道堤还没有筑成个样子，更不用说巩固了。估计到蒋顽必将来犯，我们除军区主力要加紧反攻，努力扩大解放区并巩固和扩大部队外，两个军分区都要抓紧建成自己的地方主力，各县

的游击队要赶快建成独立团或比较正规的游击大队，县以下各区都要有游击队，各村都要普遍建立起民兵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豫皖苏解放区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巩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中心区的群众发动起来，以便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向外发展。在讨论发动群众的工作时，强调既要依靠基本群众（贫雇农和中农），又要团结一切抗日民主阶层特别是有影响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要注意统战工作。为此，认为用共产党员的名字（无论是烈士或著名人物）作为县名，很难到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的同意。会上决定恢复杞县、睢县和太康的名称。于是，杞南（芝辅县）和杞北（克威县）合而为一，两个县委合成一个县委，由我去担任县委书记；两个县政府和两个县大队也都合并。因为合并必须有人事变动，而我在那里工作不到半年，所以现在连县长、副县长以及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和副政委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杞县工作团共有一百多个干部，以十二地委各县的干部为最多，其次是十三地委的干部，再加上区党委和行署机关的干部。另外还有刚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我把全团人员集中起来经过动员之后，又把他们分配到 11 个基点村去，每个基点村一个工作组，首先在基点村发动群众，然后推广到附近的村庄。把工作团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又把两个县大队合并的问题处理好，因为军分区副政委李中一是我在延安就熟悉的老战友，而且还是四川同乡，所以一切麻烦都靠他来帮

助解决。随后我把杞县县委和县政府的驻地安放在赵村吴芝辅的大院里。为了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和建设新杞县，我以工作团团长的身分和县长共同具名邀请杞县各界著名人士来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我做抗日反攻的政治形势报告；县长则阐明有关减租减息的政策问题。刚从开封出来的一位女大学生，是学音乐的，会作曲，会唱歌，也会弹琴，她把我刚写成的一首《眼看日本快完蛋》的歌词，按河南曲调谱成新歌，并且当场自弹自唱地表演，赢得全体与会者喝彩。随即又有两个大学生出来讲话，一个痛诉敌占区人民的苦难；一个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前者哭诉得泪流满面，后者激动得怒发冲冠，所有的人听了都十分感动。这次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有几个士绅在会后说，共产党在这里坚持抗战多难啊！现在实行减租减息，也是为了抗日反攻，我们有什么话可说，就是割下一块肉，也只得忍痛了。开完这个座谈会后，全县的领导干部，除留下个别同志照顾日常工作外，其余的全都下到基点村坐村去了。

八、在大李庄坐村

大李庄是杞县南部的封建堡垒之一。当时，敌伪还盘踞着杞县城，大李庄便成为杞南的中心地区，如果不把大李庄的封建势力打垮，要在杞县以至睢、杞、太地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很困难，即使表面上建设起来了，也很难巩固。因此，我选择大李庄作为基点，并到那里去坐村。